



赵浩生

名人采访集

他的梦话的话题是东西 [美] 赵浩生 著

大精深的题目以梦话的形式道来，使人感到是深入浅出，诙谐横生精彩绝伦。他说他不反对很多画家醉心于西方艺术，模仿推崇西方大师如毕加索等的画风；但他自己认为，不同民族更应着重于宣扬自己的民族形式、民族传统。他以中国的民间艺术如农民画、山歌、土风舞和西方的同类艺术作比较，並以现身说法，手舞足蹈又演又唱。这些精彩的演唱，像一个梦游者的表演，把听众也带入梦境。这是中国艺术的魅力，是韩美林的魔力。

当他的梦话结束挥毫作画时，那一划、一钩、一点、一撇……都活生生的跃然纸上。韩美林画的各种动物人物无不感到它们的音容笑貌，有时可以从纸面

新华出版社

赵浩生名人采访集

〔美〕赵浩生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浩生名人采访集 / (美) 赵浩生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12

ISBN 7 - 5011 - 5273 - X

I. 赵… II. 赵… III. 新闻报道 - 作品集 - 美国 - 当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4592 号

赵浩生名人采访集

[美] 赵浩生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0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11 - 5273 - X/K·354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谈访谈（代前言）	（ 1 ）
宋健谈科技	（ 3 ）
两代人物一个愿望	
——访邹家华部长谈邹韬奋先生	（ 7 ）
令人艳羡的缪老	
——悼缪云台先生	（ 16 ）
穆青——我的“三同”老友	（ 19 ）
商业道德和商人典范	
——从董浩云谈到“宁波帮”	（ 22 ）
韩美林梦中谈艺	（ 25 ）
一副肖像胜千言	
——观李延声中外名人速写	（ 27 ）
林语堂 70 述感	（ 29 ）
钱穆在耶鲁大学	（ 34 ）
贝聿铭的王冠	（ 50 ）
天才数学家华罗庚	（ 60 ）
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	（ 63 ）
冯友兰说京戏谈哲学	（ 83 ）

谢冰心谈往事谈创作	(93)
与杜聿明、文强长谈	(112)
曹禺从《雷雨》谈到《王昭君》	(140)
周扬笑谈历史功过	(158)
茅盾谈 30 年代的文学与革命	(180)
夏衍回忆留学日本到中国解放	(195)
臧克家高歌叙旧	(205)
吴作人夫妇谈徐悲鸿	(222)
赵丹、张瑞芳的艺术生活	(243)
留得青山在	
——记与林默涵、夏衍、曹禺、臧克家、吴作人、 萧淑芳、李可染、赵丹、张瑞芳的会见	(282)

谈 访 谈 (代前言)

赵浩生

我今年蠢长 80 岁，倘若有人问我，要是时光倒流，儿时可再，我最喜欢干的是什么职业，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新闻记者。”

我愿意做记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接触人。做记者接触人的机会最多，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都有和他们接触的机会。接触容易，但要深刻地了解他们，从他们口中挖掘新闻则需要特别的技巧。说是技巧并不完全正确，更正确地说是一个从事人物访谈的记者应具的条件。

一个记者的首要条件是要赢得被采访者的信任，当你和被访问者最初见面的一刹那，双方都在全神贯注地估量对方，这初见的刹那，并不决定是一见钟情或是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你态度的诚恳和所提问题的深度，会建立起对方对你的信任，信任的大门一开，你就可以登堂入室更深刻地了解你访问的对象，有了这个信任的基础，你访问的对象也就会渐渐地自动解除武装，减少戒心，更自然地回答你的问题。

你应当适时地向他坦率表明你要知道全部的故事，希望他知无不言，但发表时一定尊重他的意见有所取舍，而且向他保证所发表的部分只是背景知识，一定为他保密，这是新闻道德，也是做人的道德。

有些记者慨叹记者是交游遍天下知己无一人，因为在人们眼中记者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职业，愿跟你来往的人心里一定有所图。但这并不妨碍一个记者交朋友。在我所接触的新闻人物中，

以新闻人物开始，逐渐发展为无话不谈的知己，这时，对方已忘记你是记者，你也不把他当做新闻人物，你们所谈的已不限于新闻，他可以向你坦陈内心的喜怒哀乐，你成为他的同情者、知音客，甚至成为帮他解决问题的谋士，当然，一般人交朋友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但只有记者的接触面大，机会多，以记者身份广交天下客和其他交友的情况并无二致，但友谊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一个人的修养、品格。

我不赞成西方有些所谓名记者那种咄咄逼人甚至盛气凌人的采访方式，他们之所以如此，是自认为自己代表民意、舆论来质问当道，在心理上甚至有点自大狂，因为在美国，一位总统的年薪不过30万美金，一位名牌记者动辄数百万，因而养成一些名记者的骄狂自大，美国人民对这种盛气凌人的作风并不欣赏，人们常常在投书或意见中称这些记者为：“没有持枪执照乱开枪的人。”也有人问这些记者：“是谁投票选举你的？”美国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这些记者就披着这张虎皮，在导演的精心设计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名利双收的英雄人物。

人物访谈要有内容，有深度，有新闻价值，更要有历史价值，记者的人物访谈，其格调应该有大政治家畅谈天下事、大学者纵论人生与宇宙奥秘的高度，访问者与被访问者要有同等交流的智商，才能使读者和观众感到意味无穷。

1971年中美交恶20多年之后，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到北京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个历史性会见中双方的访谈对话，尼克松是位政治家，基辛格是政治家兼学者，毛主席不只是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大思想家、哲学家和革命家。在他们的谈话中很少涉及现实政治，而是令人心旷神怡潇洒幽默的茶余闲话，在中南海的书香茶香中，写下了历史最重要的一页。这是历史最重要的一页，也是最精彩的新闻访谈记录，是每一位从事人物访谈的记者所应努力攀登的高峰。

宋健谈科技

龙的传人发明火药，但被别人发展利用，结果，发明火药的子孙反被欺侮，只有用“先前阔”聊以自慰。这是历史的悲剧。

这个悲剧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今天，新中国不但拥有自卫的核武器，并且开始为外国发射通讯卫星。这是个历史性的转变，这个大转变和许多献身祖国的科学家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钱学森的推崇

去年4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据说当他当选的消息传出，航天工业部的科学家们向他致贺时，他曾谦逊的说“我只不过做了前一辈科学家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接着他兴奋的跟大家说：“要祝贺的话，我提议祝贺一位有作为的科学家，他比我年轻，那就是宋健同志！”

宋健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外“控制系统”界一致击赏的名字，但一般外行对他的成就知道得不多。我们在海外只听说他留苏8年，回国后主持第一代地对空导弹控制系统的总

体设计，劳苦功高，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功臣之一，不过人们对他的出任科委主任后的作为并不甚了解。

年初他在北京邀宴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的负责人，作为该公司的顾问，我也参加了宴会，得以拜见这位被钱学森先生誉为“控制理论权威”的人物。

那晚听他上天入地无所不谈。谈到科委的工作，他很坦白地说，受命之初他对科委应该干什么胸无成竹。他感到科研有中国科学院管，工业发展有各工业部负责，“科委应该干什么呢？”是他就任后首先考虑的问题。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分析中国贫穷的原因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缺乏科学技术，没有商品生产的习惯。”他认为：“欲使经济发达，需要的是在科技知识领导下的巧干，而不是单拼体力的那种苦干。”

把科技撒向农村

根据这个认识，他对科委应该干什么找到了答案——从根本下手，“把科技撒向农村。”

这个任务比把卫星送上太空还要复杂。把卫星送上太空需要冲力最大的火箭。把科技撒向农村，同样需要火力；但不像火箭那样的惊人一冲，而需要点起星星之火，最后在广大农村造成燎原的局面。因此他把这个构想定名为“星火计划”。

“星火计划”的第一步工作是动员科技人员当点火者。他说解放后中国培养了104万农业技术人才；但留在农业第一线工作的不过15万人，大多数都被分配到无用武之地的机关工作。科委要以行政分配，公开招聘等办法鼓励科技人员从部门束缚中解放出来，到中小城市和农村去承包和领导乡镇企业，创办股份企

业、集体企业或个体企业，去当经理、厂长或总工程师。他认为只要有一个人办活一个乡镇企业，就有上百的农民家庭受益。农村经济改革成功，有助于城市经济改革。

这个“星火计划”送到国务院，马上获得欣赏采纳，“星火计划”立即在全国发展起来。

“星火计划”火熊熊

计划推行至今，各地已有许多灿烂成果：杭州的鲁冠球承包集体所有企业后“一步登天”。产值从150万增加到1900万，山东的孙培杰栽培葡萄成功成为“葡萄大王”。武汉大学助理研究员周基湖组办养殖厂，帮助了100多户农民脱贫致富……这数不清的点点星火已在广大农村点燃起来。

用一句英文的套话，“星火计划”是他自己创意的“亲生孩子”，但这只是科委的工作之一。问到科委的其他计划，他要我们等着看不久将由国务院宣布的大新闻，其中包括有关电脑、激光、宇航、光纤……等尖端科学的发展，都可能造成中国历史性的重大转变。

他的工作领域从天上发展到人间，他的治学领域也逐渐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的新天地。

他很老实地说，他过去根本藐视社会科学，这是由于他认为科学万能，也是由于他对社会科学的无知，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理论，他感到不屑一顾。但在十年动乱期间，他涉猎了卢梭的《民约论》，亚当·史米兹的《国富论》等经典著作后，他的视野扩大了。

谈到他学英文的经过时，他的表情像谈到放射卫星和推行“星火计划”一样，充满热力和激动。

学习英文开“硬”功

人们实在难以想像，他学英文是以读艰涩的狄更斯的小说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一个字一个字地啃”。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呵！但他咬牙坚持不放，终于苦尽甜来，他的苦学不但把他带进西方文学的胜境，而且几年以后他开始用英文写科学论文。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带有常数分控制器的分布数控制系统》，在国际科学界引起重大反响，成为大家竞相索阅的名著。

从天上到人间，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俄文到英文，几小时的快聚畅谈，使人感到这位以火箭放射卫星、把科技星火撒向农村的科学家本身就像一团火，他以火样的热情研究科技。

两代人物一个愿望

——访邹家华部长谈邹韬奋先生

我无法以平静的心情动笔来写这篇文章，因为我所要写的这个人物不但与一个大时代、大革命密切相连，更与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工作的成长变化分不开。握笔怀想，像重看到《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那几部记述抗战的历史影片。我要写的人物不是这巨片中的明星，而是推动这段历史的伟大力量。

在这段历史中，邹韬奋是一个声震中天的名字。在中国内地、港、台和全球每个角落，年过 60 的中国人中，提起邹韬奋的名字，都会引起同样的激动、景仰和追怀。

那是国难当头，全国一致要求救亡图存，我们这一代壮怀激烈的日子。韬奋先生正是那个时代的号角和旗手。他主持的《生活周刊》是当时中国人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正像周恩来总理所说：“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就是这种觉醒和团结，激发了中华民族抗敌御侮的神圣抗战。

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和《全民抗战》，在抗战中像激励人心的号角，指向胜利的大纛。上海的陷落、南京的撤退、武汉的保卫、重庆的轰炸……人们在那血火交织、颠沛流离中手握着韬奋先生的刊物，像握着抗战必胜的精神武装，没有这

个精神武装就不可能有赢得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

在战时的陪都重庆，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是大后方战时艰苦物质生活中精神生活的营养站。作为一个吃“八宝饭”（充满各种杂物的劣等米）、营养不良的流亡学生，我曾像进饭厅一样每天去生活书店汲取精神营养。生活书店的读者都是看的多买的少，每次进去，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曾站了三个小时看完高尔基的《母亲》，五个小时浏览完《安娜·卡列尼娜》，对当时的进取青年说，生活书店是一所街头大学，我们都是如渴似饥每天前往“站读”的学生；而这个街头大学对我一生影响之大，远远超过我以后就读和执教的许多泱泱学府。

在这个街头大学里，我们不但学到了传统学院学不到的知识，更学到了进步的思想 and 人生观、世界观，从而决定了每个人生活的道路，在当时是走向抗战、走向革命、走向延安。

这个大学遍及大后方的每个角落，大后方的进步青年都是这个大学的学生，都是韬奋先生的崇拜者，都在读韬奋、学韬奋。作为一个从最穷苦的家庭、最落后的地区流亡到大后方的青年，这个大学给了我激励，给了我自信。我在读韬奋、学韬奋之外，更暗自下了作韬奋的决心。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决心，是和对韬奋先生的崇敬分不开的。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这半个世纪中，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壮大。韬奋先生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逝世，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理想实现了。在他的引导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虽然今天都已到了日薄西山的年龄，但想到在韬奋先生这个光辉的名字照耀下的那段如火如荼、血泪交织的岁月，都感到无限的激动、景仰和追怀。邹韬奋这个光辉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岁月所消磨。

数年前我到北京的北方工业公司展览馆参观，遇见一位年轻干练的陪同。主人介绍他是“小邹”，我脱口而出提到我记忆中

最熟悉的名字问他：“是不是邹韬奋的邹？”没想到他就是韬奋先生的长孙。我当时激动得像见到自己的亲人，和他谈起半个世纪前他祖父在人们心中的伟大形象。作为邹氏的后代，我相信他对韬奋先生所生长、所创造的时代，一定有清楚的了解；但韬奋先生并不只是邹氏家族的骄傲，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如何认识韬奋先生的伟大，承继和发扬韬奋精神，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去年11月，我又以见到亲人的心情访问了韬奋先生的公子，中国国务委员、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邹家华。在这次亲切的长谈中，我不但对这位使人在半世纪后仍然感到激动、景仰、追怀的人物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更发现，中国第二代革命家的经历虽然与老一代不同，但两代人建设新中国的愿望和为实现这个愿望所付出的努力并无二致。

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工作像一条滚滚长河，浪浪相推，永无休止！

以下是这次访问录音记录的一部分（原稿未经邹家华部长过目，若有错误，当由记录者负责）：

赵：韬奋先生是您的父亲，我对他的道德、文章的崇敬心情，也像对一位父辈一样，至少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私淑弟子，所以希望您能让我们分享对他一生行谊的了解。您最初是不是住在上海？

邹：我出生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前一直都在上海，当时年纪很小，1937年才11岁，对父亲的一些活动，不太懂。这期间曾经历了鲁迅先生去世，“七君子”被捕，“八一三”和“七七”事变，这是一些大事。平常我们孩子只是上学念书。

这些大事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七君子”被捕。在上海被捕，被送到苏州看守所。我们孩子随着母亲及别的一些朋友去看望他们。当时群众热烈欢迎他们的许多场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的体会是有这么多人欢迎他们，他们一定做得很

对。他们不应当被关起来。日本把我们欺侮成那个样子，为什么不能抗日？以我们的年纪，脑子里所能得到的反应就是如此。1933年中间有一段，因为国民党的迫害，他出国流亡，从家里听到的，是他在国内待不下去了，只好出国。我们送他上船的情况，至今还有些印象。

“八一三”事变以后，他先离开上海到了武汉。母亲领着我们经香港赶到武汉时，他又先到了重庆。后来我们也从武汉到重庆去了。

赵：你在香港念过书吗？

邹：30年代去过一次，抗战开始时去过一次，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到香港，在培正中学念过书。香港我去过三次，住过三个地方，一个是跑马地，我父亲在那里办《抗战》周刊；后来在九龙培正中学上学的时候，住在正对培正中学的那条街；第三次住在弥顿道的最南端半岛酒店斜对过，开开窗户，下面就是小孩们玩的足球场，对着海。我前年去看，完全变样了，不过培正中学我找到了。

1938年到重庆后，先进小学，很快就进了沙坪坝的南渝中学，实际上就是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办的南开中学。念到初中三年快要毕业的时候，发生了皖南事变，我父亲又走了。他当时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把56个生活书店都封闭了。他在重庆没法待下去，就从重庆跑到香港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年纪大了些，读到初中二三年级，对国民党迫害的情况知道了一些。父亲走了以后，母亲住在城里，国民党特务天天去。父亲没走的时候，他写文章、办书店，参加政治活动，我们虽然知道，但了解得不多。星期六、日回到城里的家里，碰到日本飞机轰炸，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人跑到沈钧儒侄子家的防空洞去躲警报。我们住的地方和陈果夫的家在一块儿，一个院子进去，一幢房子陈果夫住，另一幢是我们三家一起租的。

我们住在楼下；楼上一家姓周，他的儿子比我大一点，在南开高中；另外还有一家。我父亲一走，国民党特务就天天往我们家跑，不断威胁我的母亲。我们感到住不下去了，就决定走。当时是1941年，我15岁，弟妹都还小。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利用躲警报的机会逃走。因为特务也要躲警报。我们只带了两个箱子，从重庆过江到南岸，乘一家汽车公司的车子到贵阳。从贵阳又到桂林。后来就靠步行了。有一位生活书店的同志陪我们，还雇了一乘轿子，孩子们走不动的时候坐坐。经过玉林走到湛江，然后从雷州半岛坐船到了香港。当时是逃难，我们坐在货船的最下层，上面都是运往香港的鸡、鸭。

到了香港，住在九龙，我就进培正念书。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发生，我们从九龙跑到香港。当时香港的英军已经没有战斗力，日军从东面登陆往西打，到圣诞节英军便投降了。

躲到香港后，我们又和父亲分开了。母亲带着我们住在一个贫民窟。这是党的安排，利用贫民窟作掩护。父亲的生活一向由母亲照顾，和我们分开以后，母亲很不放心，又找到父亲，他当时住在一个饭馆里。日本占领香港之初，非常混乱，组织上决定把在香港的这批文化人救出来。先后分批把金仲华、茅盾等人从香港送到华南地区。我父亲也被救到华南。

父亲走了以后，母亲也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跟着去找。父亲因为工作和革命的需要都是一个人先走，我母亲总是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奔走。我记得当时离开香港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到华南根据地，日本人搜查、盘问非常野蛮，最后总算平安到了华南。我们和父亲一块儿住在阳泰山。在山上有两个寮，是草篷子，没有墙，住了很多人。有我们一家，有于伶，还有一个裁缝和一个国民党的少校，因为附近有一个空军部队。我们就住在这么一个混杂的地方，这样反而利于隐蔽。从我父亲到我们全家，倘若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我们早就完了。

赵：韬奋先生是去世之后才追认为党员的，但事实上，他生前一直受到党的照顾。

邹：是的，后来我们知道的很多情况，证实了这个事实。他在1937—1938年间，已经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的要求。周恩来当时考虑，从党员的条件上来讲，那没有问题，但是从当时历史的情况来看，还是在党外做工作更加有利。因为如果你是党员，别人会以为你当然是代表党来讲话；但作为一个党外人士，从客观的立场讲话，就更具有说服力。在这个问题上，父亲一直是按着这个要求来做工作的。在这个过程中，譬如在重庆时期，他跟党组织的关系非常多，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到生活书店去做过报告，宣传抗战，对他都有很大的教育与影响。

我们1942年到了桂林。那时，我父亲在广东梅县，后来经过日本占领区到了上海。那时上海也被日军占领。父亲从上海到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考察，看到解放区的情况，感到非常高兴，称这个地区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光明地区。当时战争非常厉害，他的病也越来越重。陈毅请示中央，决定把他送回上海，想尽办法治疗。他刚到根据地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只以为是中耳炎，回到上海以后才住院。起初我姑母在上海照顾他，动了手术。这时，我们知道了，决定我一个人先到上海，后来母亲也带着妹妹到了上海。弟弟则从桂林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周恩来的安排，八路军办事处把他送到了延安。

在上海这一段我们看到父亲坚强地和病痛斗争，还在伏案继续写他到解放区考察的报道。最后还写了临终时的遗嘱。1944年，他去世了。

父亲去世以后，组织上就派人到上海跟我母亲商量，是不是把我接到根据地。我母亲同意了。妹妹还小，就留在母亲身边。我1944年12月到了根据地，18岁。以后整个的历史就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到根据地以后，1945年新四军办了一个建设